

誰是牛罵頭人

「牛罵頭」為臺中市清水區(原臺中縣清水鎮)的古稱，源自於平埔族群中拍瀑拉族(Papora)牛罵社(Gomach)之音譯漢字。而牛罵頭遺址文化園區所在地，即是以清水舊稱命名的「牛罵頭考古遺址」，其中含多個文化層，代表著不同時期史前人來此地居住所留下的遺跡。而到了十七世紀時，荷蘭人據台所留下的歷史文獻中，記載著日後被歸為拍瀑拉族的牛罵社曾於鄰近地方居住。「牛罵頭考古遺址」、「牛罵頭文化」與「牛罵社」三個看似相似的名詞，彼此的內涵卻大有不同。

什麼是牛罵頭考古遺址？

「牛罵頭考古遺址」指的就是考古遺址所在的地點，當中堆積了四個史前文化層，由早而晚依序是大坌坑文化、牛罵頭文化、營埔文化、番仔園文化。而「牛罵頭文化」指的是，在距今 4500-3400 年左右，以繩紋紅陶為特色的史前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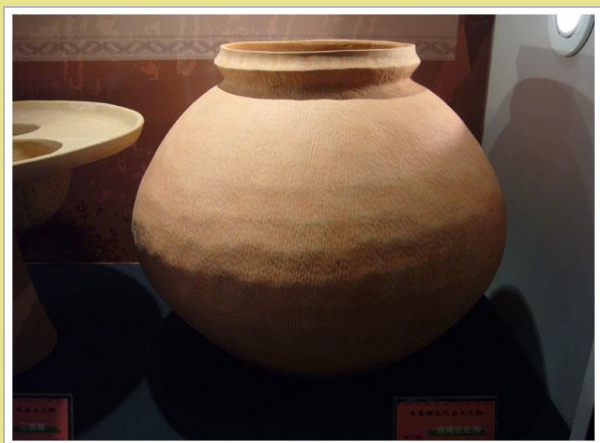
牛罵頭遺址文化園區現況

什麼是牛罵頭文化？

牛罵頭文化人除了在牛罵頭考古遺址留下生活過的蹤跡，也廣泛分布於中部地區，他們大多居住在海岸和河湖沿岸，但晚期也漸漸朝中游的丘陵山地分布。隨著時間的流動，牛罵頭文化人離去後，又來了新的一群人，也同樣居住在牛罵頭這個地方，就是後來的營埔文化與番仔園文化。

什麼是牛罵社？

「牛罵社」是拍瀑拉族其中一個村社，其聚落位置在今臺中市清水區(原臺中縣清水鎮)內。文獻上關於牛罵社的記載，首推十七世紀荷蘭據臺時（西元 1624 年至 1661 年）所留下的資料。當時荷人為了統治與抽稅之便，曾於西元 1644 年至 1657 年，針對臺灣原住民（福爾摩沙人）進行了約九次的戶口調查工作，其中又以 1650 年（明永曆四年）的調查最為詳細。該年戶口表記錄了當時北部、南部、淡水、卑南覓等四個地方集會區，共 315 個村落的戶口，而中部地區在當時分屬北部集會區及淡水地方區，共 13 個村落(王嵩山等，2000)。其中，北部集會區中的 Gomach（牛罵社）、Salach（沙轆社）、Bodor（水裡社）、Dorida（大肚社，由北、中、南大肚三社合稱）即是後來被日人學者歸為拍瀑拉族的四大社。自此，拍瀑拉族人不斷受到外來民族的干擾，也在歷經荷蘭、明鄭、清朝的統治過程中，受到漢人大量來台的影響，逐漸勢衰。到了日治時期，僅有零星的牛罵社人仍居住於原地，其餘多遷往他處或被漢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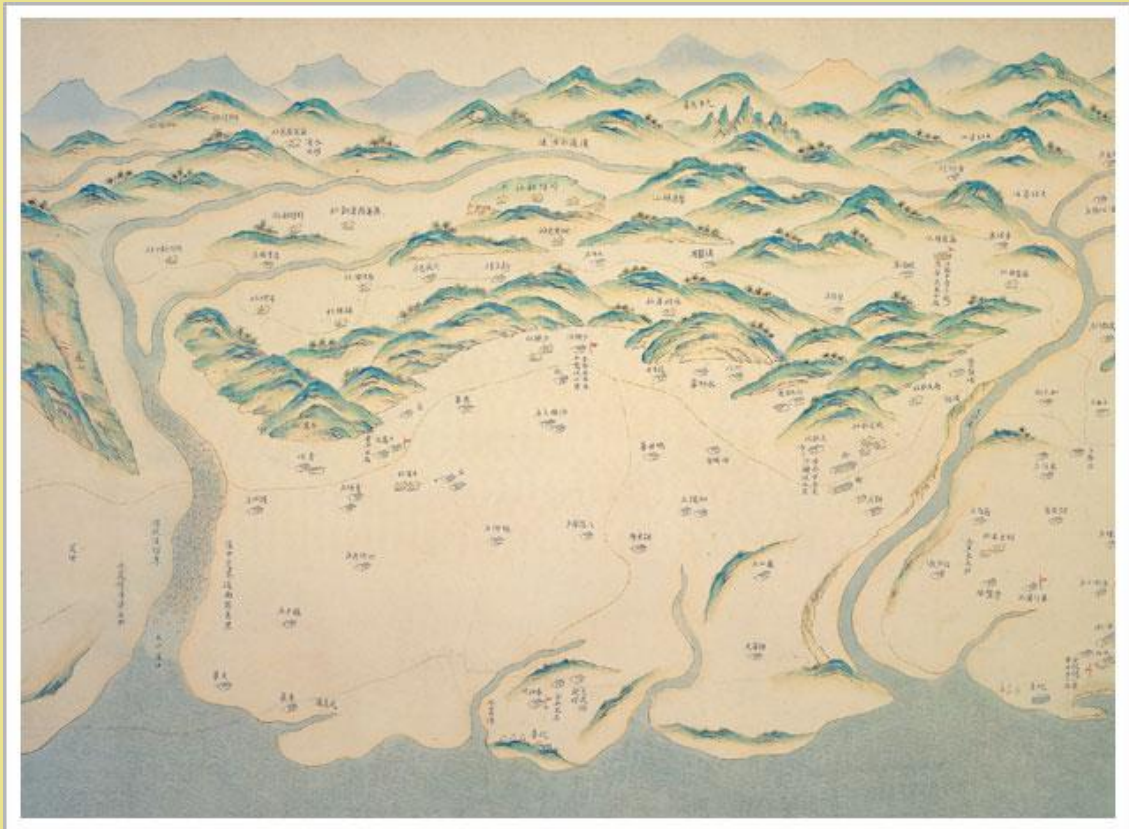
牛罵頭文化出土文物仿製復原品「細繩紋紅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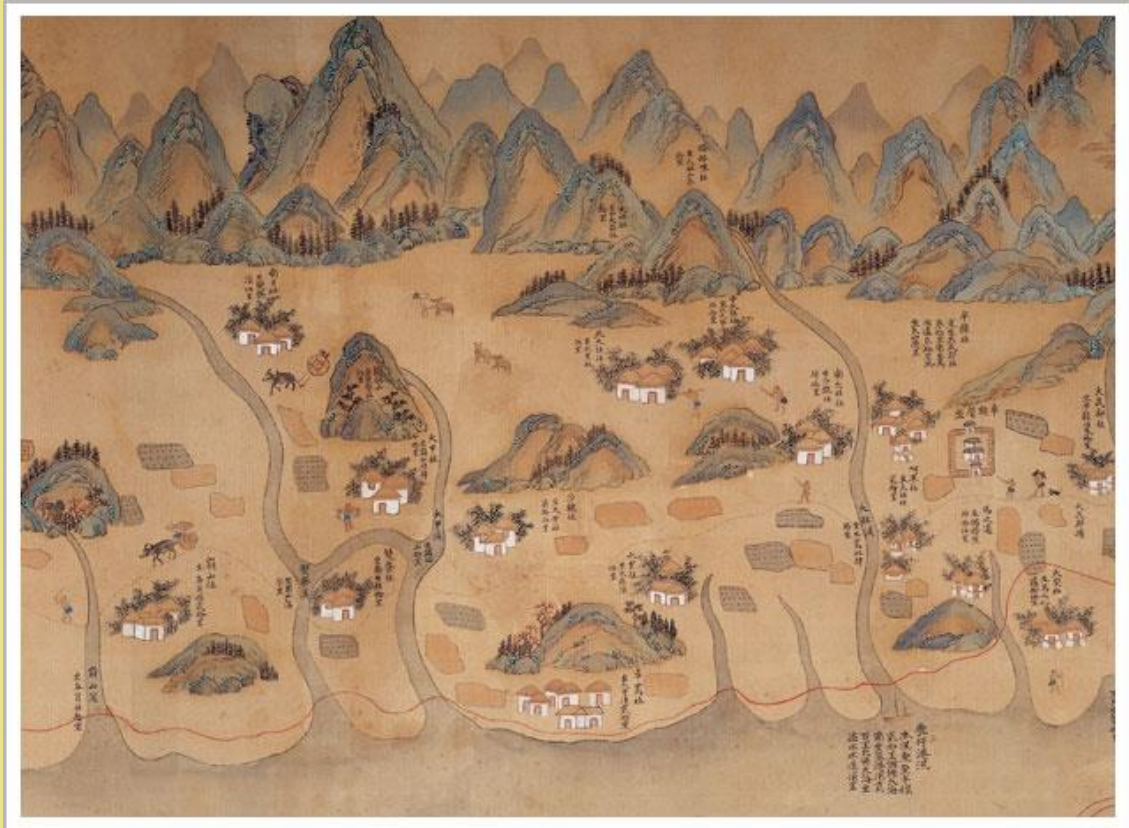
牛罵頭考古遺址出土的牛罵頭文化「陶器口緣」標本



拍瀑拉四社地理範圍



《乾隆臺灣輿圖》中記載了拍瀑拉四社。(圖片來源：國立故宮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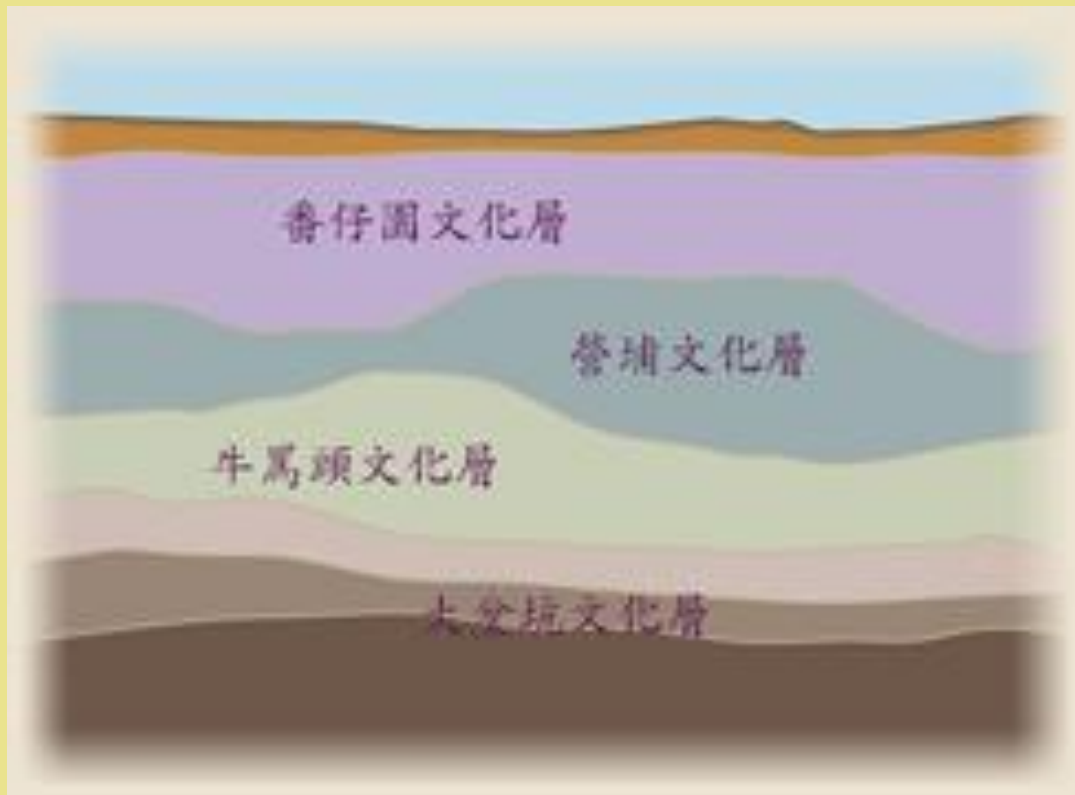


《康熙臺灣輿圖》中標示了拍瀑拉四社的地理位置，並生動描繪當時原住民的生活樣貌。

圖片來源：國立臺灣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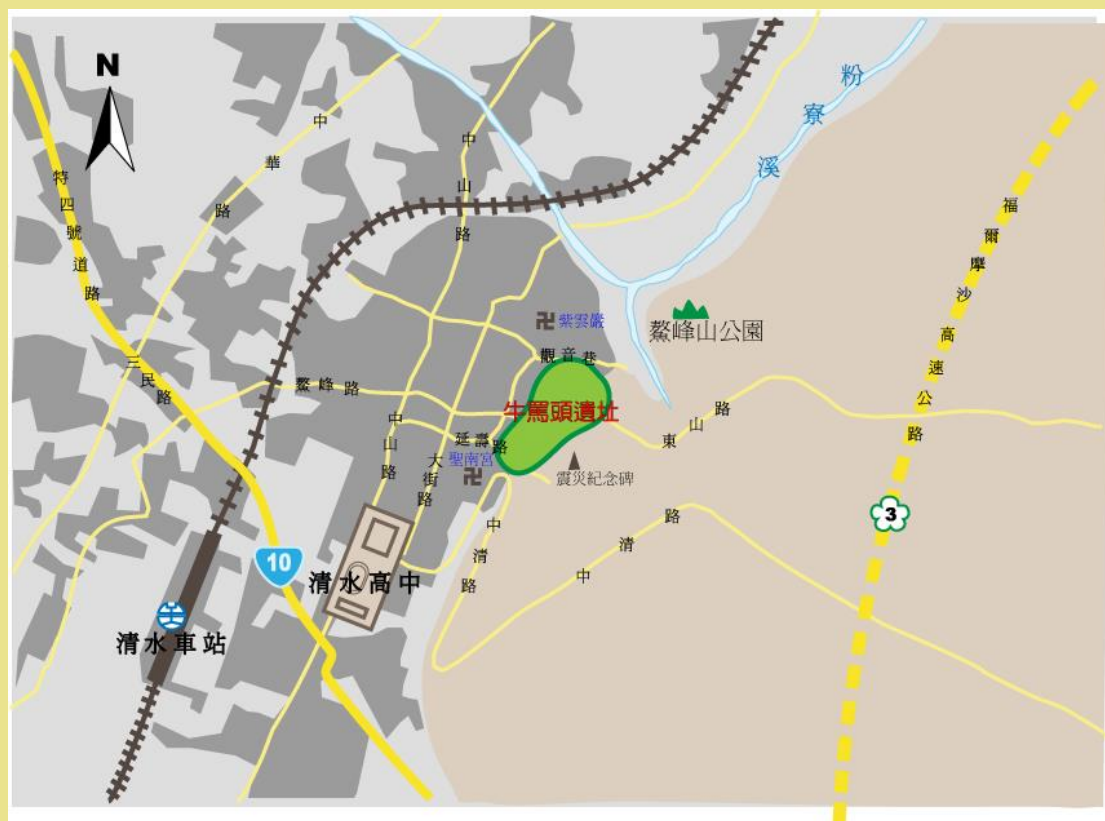


逐水而居誕生的文化



四個堆疊的文化層(大坌坑文化、牛罵頭文化、營埔文化、番仔園文化)

日升月落，臺中市清水區(原臺中縣清水鎮)的鰲峰山在沒有文字的古老歲月裡，曾經歷過數次人類聚落的更替。考古學家們從考古遺址留存的蛛絲馬跡推測，新石器時代早期的大坌坑文化人(距今 5000 年前)可能是鰲峰山最早的住民，並且漸漸發展演變成為新石器時代中期的牛罵頭文化人(距今 4500-3400 年前)。其後，新石器時代晚期的營埔文化人(距今約 3400-2000 年之前)在此居住，並逐步發展演變成金屬器與石器併用時代的番仔園文化人(距今約 2000-350 年前)。這些史前人的生活遺物埋藏在泥土裡，新的文化地層堆疊在舊的文化地層上面，形成一層層含有古代遺物及遺跡的「文化層」。這個位於鰲峰山半山腰上，含有多個文化層的史前考古遺址，被命名為「牛罵頭考古遺址」。牛罵頭考古遺址由早而晚依次堆積了四個史前文化層：大坌坑文化層、牛罵頭文化層、營埔文化層、番仔園文化層，恰好說明了中部地區史前文化從新石器時代早期到金屬器與石器併用時代的一連串發展過程(劉益昌，1999)。



牛罵頭考古遺址位置圖

考古學家推測牛罵頭文化可能是由大坌坑文化發展演變而來，牛罵頭文化人大多居住在海岸和河湖沿岸，後來也逐漸向中游的丘陵山地遷移。牛罵頭文化以臺中市清水區(原臺中縣清水鎮)的牛罵頭考古遺址命名，但其分佈範圍不只限於牛罵頭考古遺址，在苗栗縣、臺中市、南投縣、彰化縣等地都有發現多處同屬於牛罵頭文化層的考古遺址(劉益昌，1999)。

營埔文化是臺灣中部新石器時代晚期的代表文化。考古遺址分布範圍在中部濁水溪、大肚溪、大甲溪流域中、下游地區的河邊階地與丘陵，分布廣泛，聚落較大，居住時間也較久。也由於分布範圍較廣，營埔文化各考古遺址的文化內涵出現了一些地方性的變遷，而在牛罵頭考古遺址所發現的，是屬於營埔文化盛期的「營埔類型」。雖然出現地方特色，但整體來看，營埔文化共同的特徵仍然明顯(劉益昌，1999)。

番仔園文化分佈幾乎涵蓋整個中部沿海及沿河地區，可能是由營埔文化晚期逐步發展而來。番仔園文化又分為早期的「番仔園類型」與晚期的「鹿寮類型」，考古學家認為在牛罵頭考古遺址最上層的番仔園文化屬於早期的番仔園類型，但是因為牛罵頭考古遺址所在位置在日治時代有神社興建，光復後國軍軍營又駐紮於此，干擾了史前文化層的完整性，另外，從資料顯示番仔園文化人主要活動地點應為沿海平原，推測位於半山腰上的牛罵頭考古遺址並非番仔

園文化人主要居住地，可能只有少部份人居住於此(劉益昌，1999)。雖然受到了人為的干擾與破壞，但是相較於其他中部平原地區所出土的史前文化，牛罵頭考古遺址地表採集及挖掘的最早紀錄與重要的文化層累積，仍然相當具有研究與保存的價值。

今天，牛罵頭考古遺址是處於乾燥荒蕪的狀態，多半是一些對環境適應力較強的長柄菊、南美蟛蜞菊、生命力旺盛的大黍草生長於此(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2003)。但在四千年前左右(牛罵頭文化時期)，這裡曾經是潮溼多水的環境，最常見的是生長在水中的睡蓮屬植物。後來，此處漸漸演變成為淺水池或潮溼的草原，以禾本科和莎草科為主要的植物群(黃增泉等，1976)。

在史前人類的足跡尚未被深埋入土中的年代，鰲峰山就已經是陽光普照、舒適宜人的生活環境。史前人類依著四季的循環交替，從自然環境中獲取生活資源，維持生活所需。當時原始的森林已經被人類破壞，重新自然生長出來的，是以草本植物為主的森林。常見的植物有耐旱、耐貧脊土壤，並且可以改善土質的相思樹屬；另外赤楊屬、睡蓮屬、蘭科、藜科、爵床屬的植物也是普遍常見的植物(黃增泉等，1976)。根據文獻資料，可以知道清代初年的鰲峰山上荊莽糾結，草木茂密，枝葉層層疊疊，抬頭往上望幾乎看不到天空，許多動物如臺灣獼猴、蛇等可能出沒於其中(郁永河，1983)，和現在的模樣完全不同。



臺灣獼猴

中部的史前文化，是一部逐水而居的故事。海平面的變化影響史前人選擇的居住地區。並且由於人口成長的壓力，使得他們不斷拓展族群生活的範圍。牛罵頭考古遺址的位置及出土遺物，顯示牛罵頭文化人往台地、丘陵等地勢較高的地區居住。到了營埔文化人時代，由於沿海平原的露出，生活空間更加寬廣，因此分布範圍最為廣泛，農業技術也更為進步。番仔園文化中出土的大量貝塚，則顯示他們懂得充份利用海中的資源。在幾個營埔文化與番仔園文化考古遺址中，出土大量的捕魚用石製網墜，讓我們知道史前人生活方式及時代及聚落的空間分佈；但是大肚山台地的番仔園文化考古遺址中，僅有少數網墜及水生動物遺骸的出土。因聚落並非位在溪流河畔旁，漁撈採集工作與其他地區相比較並不發達。



依存自然而生的人群

西南季風吹起，史前人開始在耕地上播種。根據推測，牛罵頭文化人、營埔文化人、番仔園文化人可能都是以稻穀為主要食物來源(劉益昌，2005)，並且以山田燒墾的方式進行農耕。農業發達，意味著史前人需要了解植物的特性，並懂得利用植物的營養來補充漁獵養分的不足(何傳坤，1996)。稻穀漸漸長成，到了收割的時節，史前人會把石刀的繩子套在手上，將一串串的穀穗割取下來(呂理政，1997)。稻作的收成對史前人的生活非常重要，關乎史前人是否能夠順利度過季節的流轉。



石刀用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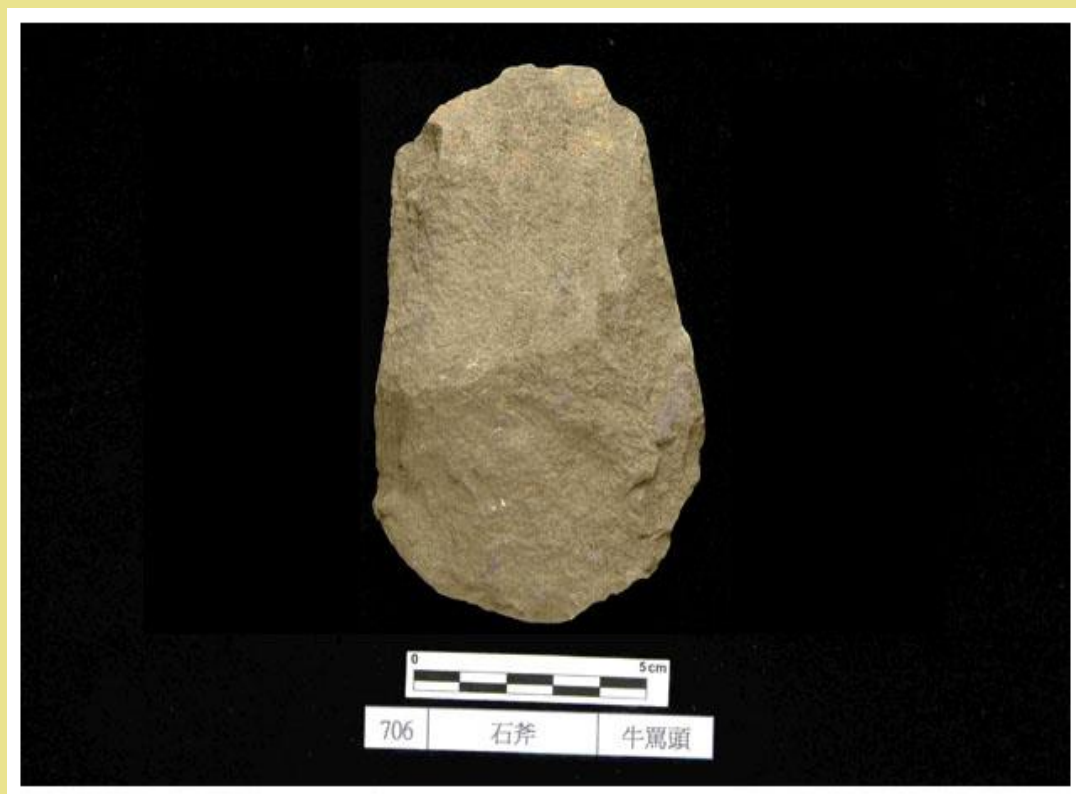
石器製作過程

為了農耕使用的需要，史前人運用生活週遭的自然資源，製作方便使用的工具。岩石是相當方便取得的工具材料，史前人將石塊碰擊與磨製成需要的形狀，製作成稱手的耕作用具。首先他們會將大塊岩石擊碎，取得符合需要的石片，再用石錘上下左右慢慢將石片敲擊出大概的形狀，接著放在砥石上來回磨製，將表面磨平，並磨出銳利的刀鋒(呂理政，1997)。石斧可以將樹木砍倒，是開闢新耕地時的重要工具。石鋤可以整平闢好的耕地，用木棒挖洞播種。為了使用工具時施力的方便，史前人利用植物纖維製成的繩子將木柄綁在石斧、石鋤上，如此操作起來更為得心應手(劉克玄，1997)。石器的使用與製作，延續了幾千年，直到番仔園文化人開始與北部十三行文化人開始交易鐵器，石器的製作才日趨沒落。雖然在牛罵頭考古遺址內並未發現顯著的農田或是狩獵遺骨，但是石器的出土提供了我們判斷當時生活狀況的線索。



牛罵頭考古遺址出土的營埔文化石刀

由於耕種所獲得的糧食有限，因此打獵、捕魚和採集果實所獲得的食物，也是重要的營養來源。番仔園文化人採集的果實包括油葉石櫟、圓果青剛櫟、梅子等，並且還會撿拾苦楝當作木材，燒烤櫟子來吃(何傳坤等，2005)。以石頭製成的網墜是捕魚時重要的工具，繫在植物纖維製成的漁網上，使漁網的重量增加，容易沉入水底，方便網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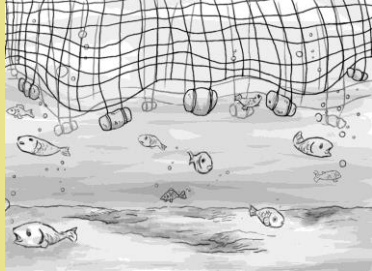




牛罵頭考古遺址出土的營埔文化石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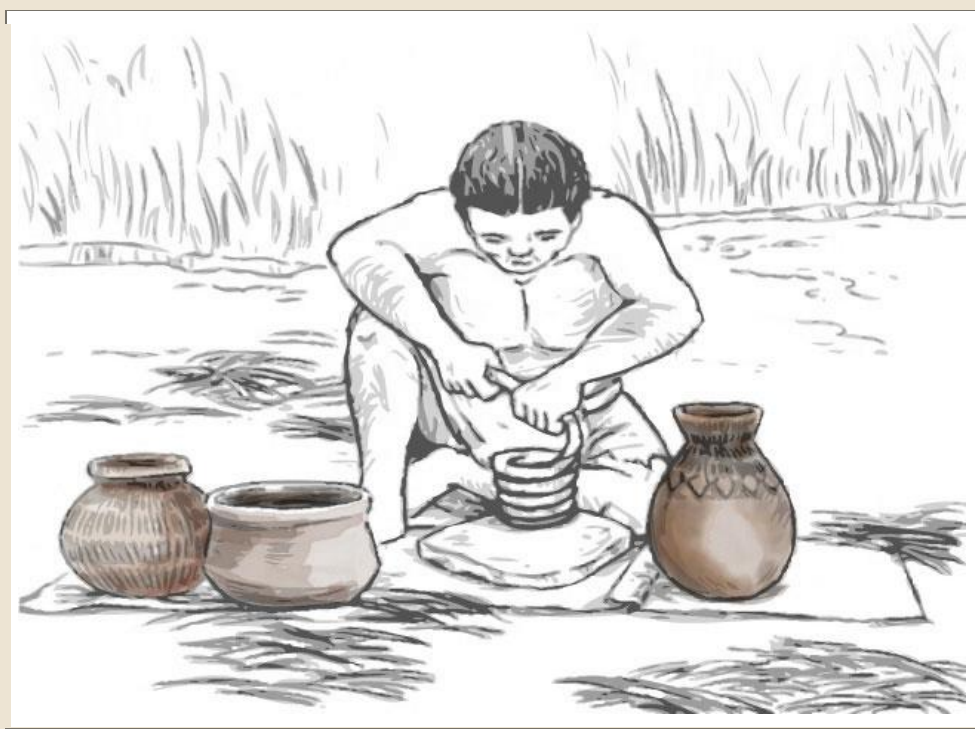
石器製作過程

對於居住在鰲峰山的史前人來說，狩獵是補給食物不足的重要來源。鹿群在草原的滋養下，長得肥肥壯壯。弓箭是史前人狩獵時的重要工具，石頭磨製出的箭頭綁上木柄，就成為可以張弓射鹿的石箭(劉克屹，1997)。營埔文化人更進一步，發展出帶柄的石製矛頭，用以近距離刺殺動物。牛罵頭文化人狩獵的對象可能是梅花鹿、山羌。番仔園文化人主要狩獵梅花鹿，除了吃鹿的肉之外，也剝製鹿皮製成衣服，將骨頭及鹿角磨成尖器等工具，他們在捕鹿時，可能會先放火驅趕，以便捕捉。另外番仔園文化人也狩獵臺灣野兔、臺灣野豬、狗獾、食蟹獾等野生動物，打獵時通常會攜帶獵犬同行(何傳坤等，2005)。

		
利用網墜捕魚	牛罵頭考古遺址出土的 牛罵頭文化石鏃	梅花鹿

鰲峰山多變的氣候，也影響到史前人的生活，陶器的製作成敗受到天氣很大的影響。降雨時，空氣中的溼氣會影響到陶器製作時陰乾的程度。陶器燒製前水分含量的多寡，直接影響到燒製的成功或失敗。因此多雨的天候並不是製陶的好時機。涼爽乾燥的天氣就非常適合製陶的工作。從牛罵頭考古遺址中出土大量的陶片，可以想見在當時人們的生活中，陶器是重要的器具之一。稻穀成為史前人類主要的食物來源，與陶器的製作出現有關。以往人類將食物煮熟的方式，是直接用火燒烤食物，但這樣的方式並不適合煮熟穀物。於是，為了熟食穀物，史前人學會製造出陶器，使用陶器來烹煮穀物(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2008/10/27)。使用陶器可以裝水，也可以煮、燜、燉，而煮過的食物讓人類更加方便進食，也更容易被消化吸收。

史前人在製陶時通常會就地取材來製作及燒製，因此不同的自然環境，會生產出別具特色的陶器。牛罵頭文化以細繩紋紅陶為主要特色，有的是以顆粒較細的陶土製成的泥質陶；有的是在陶土中摻入細砂，可以耐高溫、常被用來烹煮食物的夾砂陶。牛罵頭文化人在採土區挖掘陶土，將陶土加水、摻入細砂揉成泥團；把泥團搓成泥條後，將泥條一圈圈盤成器物的形狀；牛罵頭文化人會以木拍拍打形塑，修整器物的形狀，並且抹平表面的縫隙。接下來用石頭頂住器物內壁，以纏繞細繩的木板拍打器物外部，將水分拍出，並且藉由拍打修整器物表面，使器身平整結實。製作小型陶器時，則是利用雙手直接捏製出器型，最後在陶器口緣以細竹枝劃上紋飾，等成形的陶器陰乾後，放入疊堆成井字型的木架中央，上方覆蓋木柴和茅草，四周斜放上樹枝，由上端點火引燃茅草，使火焰由上而下燒製陶器(何傳坤等，2005)。



製陶 泥條盤築法



模擬牛罵頭時期製陶方法

繩紋紅陶是牛罵頭文化的重要特徵，修復後的器物型式與大坌坑文化類似；營埔文化的陶器則是以灰黑色為主，用波浪紋與刺點紋來做為陶器上的裝飾。番仔園文化的陶器形制精緻，品質更是大幅度的提升，甚至有出土少量經磨光的黑陶。番仔園文化人會在陶器通體上加上各式各樣的紋飾，例如刺點紋、波

浪狀櫛紋、圈點紋等，另外也有拍印的方格紋、回形紋或魚骨形紋。造成各文化陶器風格不同的原因，主要是燒製方法上的改變及燒製溫度的提升。史前人累積了無數的經驗，開始逐漸地掌握陶器燒製時的要訣。

季節循環，交互輪替。正如人類在生老病死的軌道中不斷地輪轉。史前人和自然界的動植物一樣，出生、年老、生病、死亡。從牛罵頭考古遺址附近的番仔園文化考古遺址中所出土的人骨，可以了解當時埋葬時是沒有棺槨而身體正面朝下的「俯身葬」，這是番仔園文化的特色之一。死者的頭部朝向東偏南或是東偏北，這些特色在與漢人接觸後，不同的文化交流相互影響之下，都慢慢地消失不見。目前在番仔園文化俯身的墓葬中，發現有貝塚，並出土骨角器、玻璃手鐲、玻璃珠、瑪瑙珠。這些陪葬品讓我們瞭解到，當時番仔園文化可能與周遭鄰近地區有貿易上的往來。而鐵器的出土則是與北部十三行文化經由貿易交換得來。鐵器出土數量不多，可能與鐵器容易腐朽等原因有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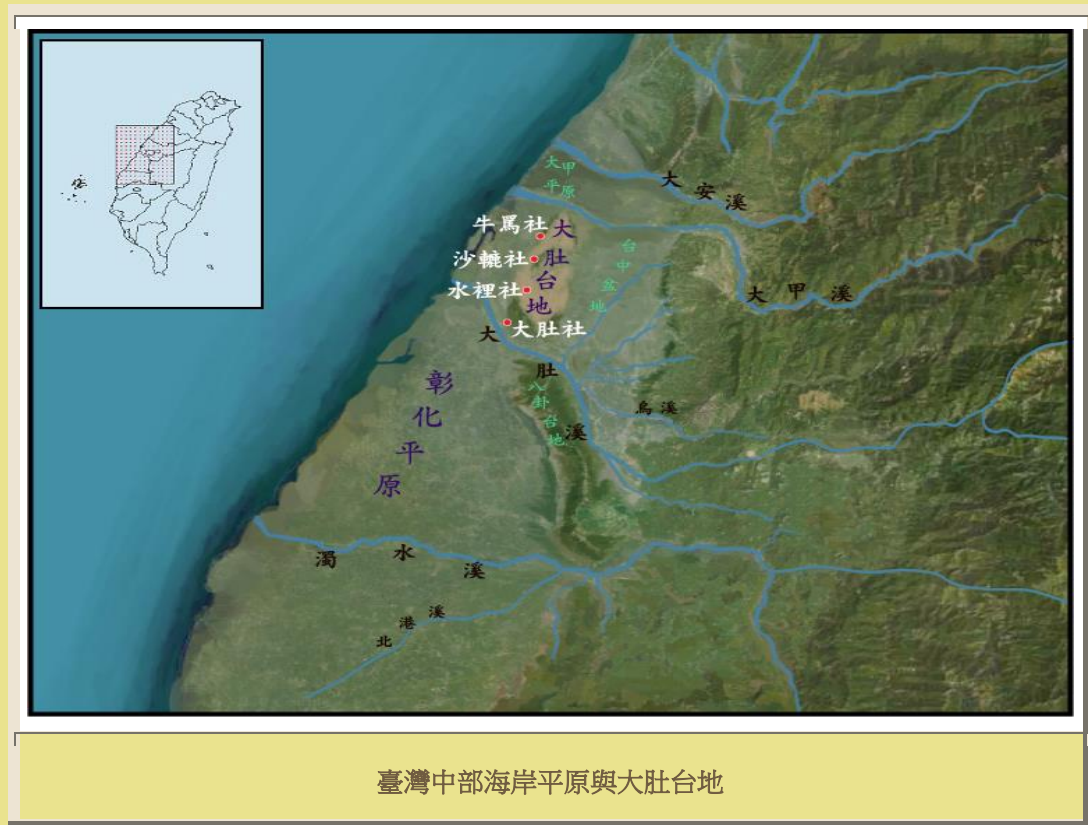
從牛罵頭文化園區這片土地出土的文物，我們看到了過去幾千年來史前人的生活線索。史前人一代又一代，伴隨著日升月落，依循著季節的轉變生活。時至今日，雖然這塊土地經過了幾千年，在時間的流逝與環境的改變之下，人的生活已經起了不同的變化，但唯有季節的流動始終不曾改變。站在鰲峰山上，低頭望著地底下存在的未知，其實，今日你我所映照的太陽，你我所感受的季節，和千年前又有什麼太大的差別呢？

	
牛罵頭文化 細繩紋紅陶	大坌坑文化 刻印紋罐



前言

牛罵頭考古遺址出土的四個文化層（大坌坑、牛罵頭、營埔、番仔園文化），在臺灣中部其他考古遺址亦有發現。我們除了可以從這些考古遺址來認識中部的史前發展與早期人類活動，也可以從文獻中所記載的平埔族群生活樣貌，了解中部地區歷史時期的常民生活。目前研究發現，被歸為拍瀑拉族的平埔原住民，其村社的生活範圍與某些番仔園文化的考古遺址有所重疊，因此學者正在努力尋找番仔園文化人可能為拍瀑拉族人先祖的蛛絲馬跡。整個中部地區的史前考古遺址，與中部平埔族群的社會文化變遷，皆可幫助我們拼湊曾經生活在此之族群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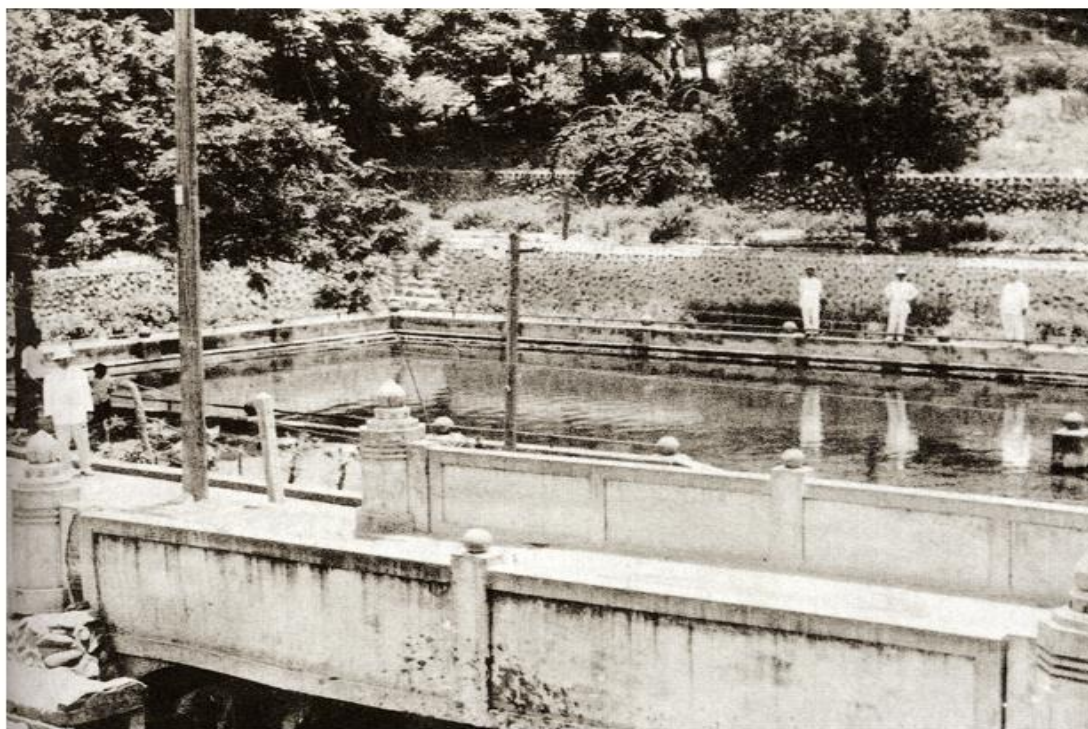


很久很久以前，在荷蘭人、西班牙人與漢人都還沒來到臺灣，就已經有許多原住民在這片土地上生活，他們可能是在距今約五千至六千年陸續遷移到臺灣的南島語族，當中除了我們較熟知的高山原住民，還有許多居住在西部平原或丘陵的平埔族。然而，不論「高山族」或「平埔族」，都是外來族群統治臺灣時，為了對原住民進行分類才產生的名稱。事實上，平埔族只是一個統稱，其中包含了複雜、多元的「土著族群」，彼此的文化都不盡相同。清代統稱臺灣原住民族所居住之地為「社」，並依照歸化清政府與否，將原住民族二分為「熟番」、「生番」；日治時期則參考此分類訂出「平埔族」與「高砂族」的學術名詞(王嵩山等，2000)。



《康熙臺灣輿圖》上記錄的牛罵社。（圖片來源：國立臺灣博物館）

而在臺灣中部，也就是今日臺中市(原臺中縣)（包括清水、梧棲、沙鹿、龍井、大肚、烏日等六區）一帶的海岸平原，就住有自日治時期開始被歸類為「拍瀑拉族(Papora)」的四大平埔部落，包括：牛罵社、沙轆社、水裡社與大肚社。這四社的人口不多，每社不過一、二百人，彼此聚集成小型村落分散各地，其中又以牛罵社的人口最多。事實上，這四社彼此之間的親疏關係各有不同，平埔原住民本身也無族群觀念，後來學者根據語言、文化等特徵，才產生拍瀑拉族這樣一個族名。



清水埤仔口（清水靈泉）（圖片來源：《牛罵頭老照片專輯》頁三十七，林振松提供）



清水區(原清水鎮)今日風貌（從牛罵頭文化園區往清水鎮方向看去的景觀）。（溫欣琳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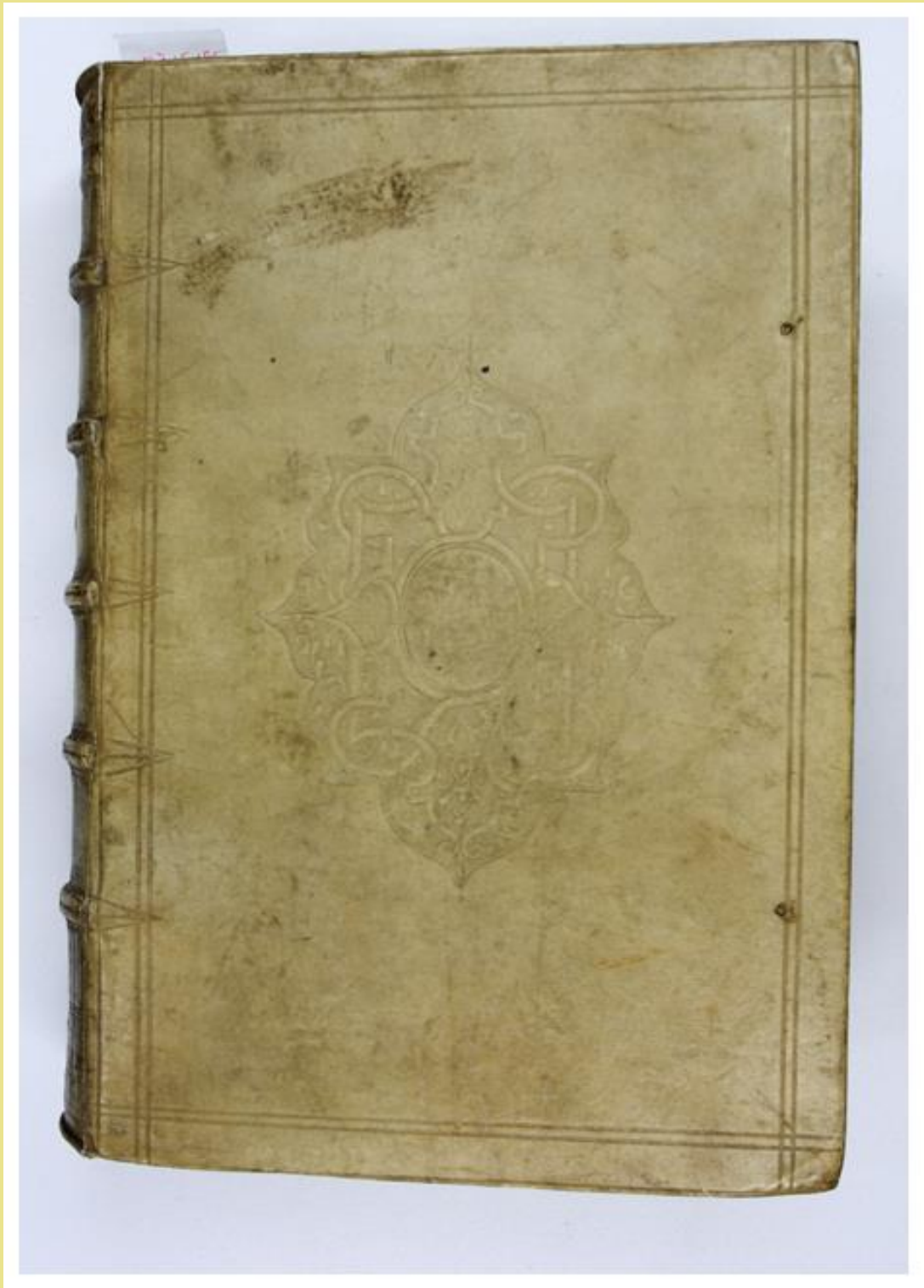


民國五十年的清水街道景觀（圖片來源：《牛罵頭老照片專輯》頁四十八，陳清淵提供）

拍瀑拉族四大社原本生活在臺灣中部的大肚山西麓一帶，也就是在大甲溪與大肚溪之間、大肚山西側至海岸地區，包括了清水隆起海岸平原與大肚台地。其中牛罵社居住在最北處，往南依序是沙轆社、水裡社，大肚社則在最南端。這一帶的環境沿著台地西麓的斷層線出現良好且豐富的湧泉，對於拍瀑拉族人來說，不但取水方便，地勢又高，比起易積水的近海地區更適合他們居住。拍瀑拉族於是便在此以小型、非固定性的形式集結他們的村落，過著自給自足的生活，並且以農獵為主要經濟活動。

在牛罵社、沙轆社過去活動的範圍，考古學家曾挖掘到了屬於番仔園文化的史前考古遺址，而考古遺址的時間、空間與該文化的生活型態都與文獻記載的牛罵、沙轆社極為接近，因此有人推測這些二千年前在此從事狩獵游耕活動的番仔園文化的主人，很有可能是拍瀑拉族的先祖。雖然平埔族的歷史可能已有數千年，但是由於史前時代沒有文字，我們很難清楚的知道早期的拍瀑拉族人究竟如何生活。一直要到荷蘭人佔據臺灣後，想開通西部平原而進軍中部，才開始對中部平埔族有較為正式的文字記載，也是在這段征討的過程，留下了對於大肚王的文獻記錄。根據翁佳音的考據，荷蘭時期的中部海岸平原，曾經出現一個以大肚王（Quataong，或音譯為柯達王）為首之跨部落、跨社群的王國，統治範圍除了四社外，更囊括了巴宰族(Pazehhe，又譯巴則海)、巴布薩族(Babuza，又稱貓霧棟族)、洪雅族(Hoanya)等至少 15 個社的廣大區域。

大肚王的統治勢力持續了近百年之久，最後因不敵清朝的征討與漢人的大量進入，使大肚王族裔的勢力不斷衰退，讓出中部平埔社群的領導權，終於造成與清朝關係友好的岸裡大社（巴宰族）之崛起。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所館藏的荷蘭古文獻《荷史第二及第三次出訪（大清）中國記》。本書於西元 1670 年出版，作者達波引用了 1650 年代末訪台的水手萊特的報導，其中曾出現大肚番王的記載。（圖片來源：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拍瀑拉族人的生活



《番社采風圖》捕鹿（圖片來源：中央研究院歷史與語言研究所）

十七世紀以前，臺灣中部的拍瀑拉族各社人，一如往常過著祖先留下的傳統生活方式。他們居住在以竹、木所搭建的干欄式建築，家屋內部簡單，通常沒有隔間，全家人的起居、飲食都同居一室。正值青壯年的未婚男子們組成一種稱為「麻達」的階級組織，集結在「公廨」，帶上鏢箭、竹弓，並在竹矢前端綁上鐵箭頭，準備出發去山中集體狩獵(王嵩山等，2000)。

由於臺灣中西部在早期，靠海一帶的平原是高草疏林，到了大肚台地則除了高草原之外，還有較為茂盛的森林。而在這一片林木草原中，相當多的臺灣梅花鹿奔馳於草原及森林的邊緣。梅花鹿適應性很高，既食草也食葉，最適合生長在像是大肚台地西側一帶、草原與森林兼備的生態環境中；鹿群在秋冬繁殖季節時交配，懷孕的母鹿則等到乾季過後、食物水源皆充沛的夏季產下小鹿(王穎等，1998)。到處可見的野生鹿群，自然而然成為早期拍瀑拉族人狩獵的最主要對象。由於捕鹿主要是為了吃鹿肉，以及穿鹿皮剝製的衣服，除了生活所需，拍瀑拉族並不會過度殺戮鹿群。



《職貢圖》所描繪的拍瀑拉族人（圖片來源：國立故宮博物院）

狩獵歸來的拍瀑拉族男子們，帶回許多新鮮的鹿肉與其他獸肉，部落裡的族人於是升起火，先將鹿肉烤熟，再放入鍋中煮，分給族人食用；同時也剖開鹿的腸子，取出快要變成糞便但又還不是糞便的草來食用，也許現代人很難想像，但是對於當時的拍瀑拉族人來說，卻是無上的美味。除了鹿之外，他們也會去撈捕了河裡的魚蝦，生食或煮熟食用。除了有捕獵的動物做為主要食物，拍瀑拉族的女子們在地力仍充足的土地種下芋頭，或小米、稻米等穀物的種子，然後便任其生長，直到作物們自然成熟後即採收，當做肉類以外的糧食。這樣旱田游耕式的農業生產力並不高，對土地利用亦有限。因此每當一處的土地利用盡了，拍瀑拉族人就會短程遷徙他們的部落，過著自由自在的游獵、游耕生活，但是彼此不會侵犯其他社的生活範圍(潘英，2001)。

在非狩獵季節與農閒時分，可能是因為舉辦慶典，也可能是為了祭儀，拍瀑拉族的男男女女，聚在一塊兒喝酒與歌舞。這是年輕男女認識對象的大好機會，因為拍瀑拉族的未婚男女只要兩情相悅，不用經過父母同意，就可以結為夫妻，而且拍瀑拉族實行父系、母系皆行的社會，因此可以嫁娶也可招贅。不過他們在婚姻上實行一夫一妻制，夫妻不合可以離異，但是不允許私通，如被查獲會遭到懲罰(王嵩山等，2000)。

部落裡的人無不趁著聚會時精心打扮。早期他們會穿著鹿皮衣，後來則演變成上半身穿著用兩幅布縫製而成的短胴衣，長度多只到肚臍而已，下半身不分男女都穿只用一幅布製成的腰裙。婦女會有裹脛的習慣，也就是在小腿包裹上長布條（白色織有花紋、或黑、或青）來保護腿部。另外，他們在身上掛著從自然環境中取材的各種裝飾品，例如男女都在頭上插上稱做「打拉」的骨簪，另外也會採集植物或是鳥類的羽毛戴上；頸部則佩掛稱為「立項帶」的珠飾、「牙堵」的瑪瑙珠，以及「夏力什素」的螺牌等飾品。他們還喜歡在身體加上毀飾，例如在臉部、甚至身體上刺青，男女都喜好穿耳洞，其中未婚男子更喜歡在耳洞內塞入貝殼、圓木等來撐大耳洞。(王嵩山等，2000)。

祭典開始了，部落裡的人互相牽手圍成一圈，一齊唱歌跳舞。平埔族的宗教屬於精靈崇拜，也就是相信人死後靈魂不滅。拍瀑拉族人死去的時候，親屬會將逝者以室內葬下葬，並以亡者平日穿著的服裝為陪葬品。結束埋葬儀式，親屬沐浴後，便進入屋內守喪十天且足不出戶，以悼念死去的親人。而依循拍瀑拉人對於祖靈的信仰，相信人死後靈魂不滅，和自然界的精靈同樣掌握生活領域中的一切福禍(王嵩山等，2000)。



拍瀑拉族聚落



臺灣梅花鹿

除了對祖靈進行祭祀之外，拍瀑拉族也會崇拜自然界之物。祖靈祭來臨時，族人舉行一種祭祖靈與賽跑成年禮的混合祭儀，這樣的「賽跑型祖靈祭」包含了「走標」的活動，也就是是青少年間的賽跑，跑到折返點後回來，獲勝者就成為族中好漢，獲得少女青睞，並且可能奠定日後成為部落長老的基礎。除了祖靈祭之外，還可能有祈年祭、播種祭、收穫祭等各式祭儀。其中，巫女會在祭祀活動中擔任重要的宗教領袖，做為人與神之間的橋樑(王嵩山等，2000)。

拍瀑拉族四社在各項祭儀中緬懷先祖，也依循著祖先留下的智慧，在部落長老的帶領下，追逐著獵物與耕地，不斷移居與發展，過著自給自足的生活。



《康熙臺灣輿圖》中，生動地描繪了原住民狩獵梅花鹿的景象。（圖片來源：國立臺灣博物館）

傳說中的大肚王國

平埔族的社會多以社為最小單位，但學者從荷蘭人和漢人的文獻記載中，認為在大肚社曾經出現一位「大肚王」，他是傳說中的中部平埔王國酋長，中部平埔王國也曾經存在；不過由於缺乏資料，我們尚無從得知究竟這個統治形態的樣貌(翁佳音，1992)。據學者考證，大肚王的名字可能是 Kamacht Aslamie，即中文文獻上的「甘仔轄」。他的勢力範圍以大肚溪流域為主，從大肚向北至后里(大安溪以南)、南至彰化甚至南投，因此曾與該部落接觸的漢人就稱他為「大肚番王」。他的勢力最盛時，統轄有二十七個村社；一般的記載中，則說他的王國有十五到十八個村社不等，其中除了拍瀑拉族，也包括部分的巴布薩族(Babuza，又稱貓霧揀族)、洪雅族(Hoanya)和巴宰族(Pazehhe)，可以說是跨部落的統治或聯盟關係(翁佳音，1992；中村孝志，1993)。

十七世紀中，拍瀑拉族可能已開始受到外來者的干擾。他們所居住的中部地區，儘管氣候宜人、水源充沛，物種也相當豐富，卻也形成了茂密而危險的叢林。不適應此地區環境的外地人，往往被複雜地形、躲在林間的猛獸，以及水土不服而生病等因素，阻絕在外。中部的自然環境因而成為統治臺灣南、北的荷蘭人，開發和打通臺灣西部的一大阻礙，同時也是拍瀑拉人在十七世紀中以前，能保有自主權和既有生活方式的天然屏障。



曾受雇西、東印度公司的德國士兵馬爾卡頓，匯集服役期間之手稿而成《東西印度驚奇旅行記》，書中描繪了臺灣原住民長老參加地方會議後，一同享用盛宴的情景。他於1648年至1650年曾造訪臺灣，留下珍貴的史料記載。（圖片來源：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根據翁佳音(1992)的研究，1638 年以前，荷蘭的東印度公司就已經知道大肚王的存在，不過此時並未派兵征討；直到 1644 年，佔據臺灣南部的荷蘭人決定擴張勢力範圍，於是派出軍隊，從台窩灣(今臺南)北上、並派另一支軍隊從淡水南下，夾攻這塊最難攻打的地方。雖然是秋高氣爽的十月，荷蘭軍卻遇到天候不佳，許多士兵在途中就病倒了；進入大肚王的勢力範圍後，地理環境提供拍瀑拉人絕佳的保護，讓躲在叢林中的拍瀑拉勇士得以用火攻出擊，雖然不算是十分激烈的戰鬥，卻逼迫荷蘭軍不得不停止攻擊、返回臺南。荷蘭人不死心，隔年一月再次出兵，派 Pieter Boong 上尉率兵偕商務員北上，要開通臺南至淡水的道路，並教化大肚王所轄村社，由雞籠(基隆)和台窩灣(臺南)分別進攻。這次荷蘭兵打敗了大肚王王國的拍瀑拉勇士；期間征服臺南至淡水之間剩餘的村，使南北通路安全。

經過幾次荷蘭人的攻擊，大肚王的勢力已不像過去那麼強大。戰敗後不久，他南下參加荷蘭人舉辦的地方會議，在會議上與公司訂約，表示服從。但大肚王仍保有一部分的統治權，例如：他們不允許基督徒在該區居住、只准通行，限制傳教士在當地的活動。由於荷蘭人多半會向原住民徵收皮革做為服從的證物，或許大肚王也得開始繳納鹿皮給荷蘭人。以往只是為了生活所需，對鹿群數量傷害不大，現在卻因為納貢的關係而大量獵殺，危害牠們的生存。

然而大肚王和其部落的子民，並非從此就平安無事。1661 年鄭成功從大陸撤退來臺，為了驅逐荷蘭人、取得臺灣做為反清復明的基地，加上金門、廈門的後援不足，駐紮的士兵開始向島上的漢人和原住民爭奪土地和資源，連位在中部的大肚王國也不能倖免。明鄭軍就地取糧的行為，引起平埔族人不滿而抵抗反亂。大肚王族裔率領部落勇士抵抗鄭軍入侵卻不敵，沙轆社甚至在 1670 年的動亂中幾乎被殺光，至十八世紀初，大肚社人也多半被迫遷往埔里一帶；這些動亂逐漸使原本安居在此的大肚王族裔和拍瀑拉族有些被逼迫到山邊，有些則和漢人一起生活而逐漸被漢化(王嵩山等，2000)。

清代康熙中葉之後(約十八世紀初)，有愈來愈多的漢人移民到臺灣，雖然政府嚴禁漢人入墾番地，但在有限的空間下，來自福建漳州的人們試圖要開拓大肚庄，越界侵耕的結果，漢人將山坡和近山地帶的鹿場開墾為農地，因此改變原本的草原地景，也影響平埔族人的生活方式，甚至其族群變遷和文化。這種改變，有的可能是出於對先進民族的仰慕而融入其中，也有部分是由於統治者的政治措施，迫使平埔族人接受外來文化。例如：清廷以「理番」政策^{*1}，

透過教育藉以改變平埔族群的觀念和思想，並賜與漢氏姓名，使之歸化(洪麗完，1997)；在生產技術上，則因外來勢力破壞原有自給自足的系統，逐漸放棄原有的狩獵生活，改學習漢人的農業定耕。受漢化影響，加上此地區乾季較長，建築形式也從干欄式建築演化成「土墩式地上住屋」，意即填土做為地基，再於地基上興建房舍，形狀就像是倒過來置放的船一般(王嵩山等，2000)。社會風俗在與漢人接觸後也有所轉變，平埔族人也學習漢人用墓葬；其固有的語言因無文字流傳，因而逐漸被漳泉鄉語或官話取代，失去特色。從生命禮俗到經濟生活、語言文化的改變，突顯外來文化對平埔族人的衝擊(前引書)。

隨著進駐中部臺灣的漢人越來越多，漢人與平埔族的衝突也越來越明顯，常常有爭戰的發生，而官員勞役、虐待平埔人也成為抗官的主要因素；此外，來自中國各地的漢人也因為開墾事宜而械鬥。這股壓力甚至導致雍正九年至十年間(1731~1732 年)爆發「大甲西聚落土著變」(亦有「大甲西社番變」說法)，大甲西社聯合鄰近數個族社抗官，牛罵社、沙轆社、水裡社和大肚社亦參加其中。在如此紛亂的時空，清朝政府採取以番治番政策，借用驍勇善戰的平埔番—巴宰族的力量平亂。經過十一個月，反抗的各社終究被清廷討平，並且被迫改名，例如如道卡司族的大甲西社改名「德化社」、貓孟社改名「興隆社」；拍瀑拉族的牛罵社改名為「感恩社」、沙轆社改為「遷善社」等。自此，巴宰族逐漸被清廷所重用，中部臺灣的勢力也因此產生變化。原本的統治者大肚王勢力不再，開始以巴宰族的岸裡大社為掌權之首的新時代。(洪麗完，1997；王嵩山等，2000)

*1 洪麗完(1997)認為，雍正以前清廷「理番」並無一定政策，僅以招撫、勸其歸化，極少懲罰，1731 年大甲西社番變之後，才一改消極作風，採用「順撫逆剿」策略；但為了避免漢番之間再因土地糾紛生亂，訂出保護社民、漢人禁越番境，以及嚴禁土地買賣、擅取番婦等政策(頁 65~69)。為解決漢番之間日益紛雜的事務及衍生的問題，乾隆 33 年(1768 年)設首任北路理番同知於彰化縣，是為清廷正式的理番專職機構，乾隆 53 年(1788 年)北路理番同知遷往鹿港(王雲洲，2003)。



岸裡大社的崛起

康熙中葉，進駐臺灣中部的漢人越來越多，漢人與平埔族的衝突也越來越明顯，常有爭戰的發生，此外，來自中國各地的漢人也因為開墾事宜而械鬥，在如此紛亂的時空，清朝政府採取以番治番政策，借用驍勇善戰之平埔番－巴宰族（Pazeh）的力量來平亂，從此巴宰族逐漸被清廷所重用，臺灣中部的勢力也因此產生變化，原本的大肚王勢力已式微，開始由巴宰族的岸裡大社掌權。

故事從康熙三十八年（1699）說起，道卡斯族（Taokas）因不滿漢人通事黃申，大甲溪北方的吞霄社土官便率領眾人抵抗清官，「殺申及其夥十數人」，引發「吞霄社事件」，當時清廷調動大批人馬前往征討，並借助南部西拉雅族新港、蕭壠、麻豆與目加溜灣等四社番人的力量，以他們為前鋒對抗吞霄社，但是吞霄社人全力防守抗衡，「四社番傷死甚眾」，清廷接受獻計、派遣翻譯入大甲溪北岸內山說服岸裡番，並贈與大批糖、煙、銀兩及布匹，岸裡社人便由山後包抄，捕追亂民方得以平亂。這次的平亂事件是巴宰族岸裡社群首次被清廷重用，同時也是中部平埔族群勢力重整的開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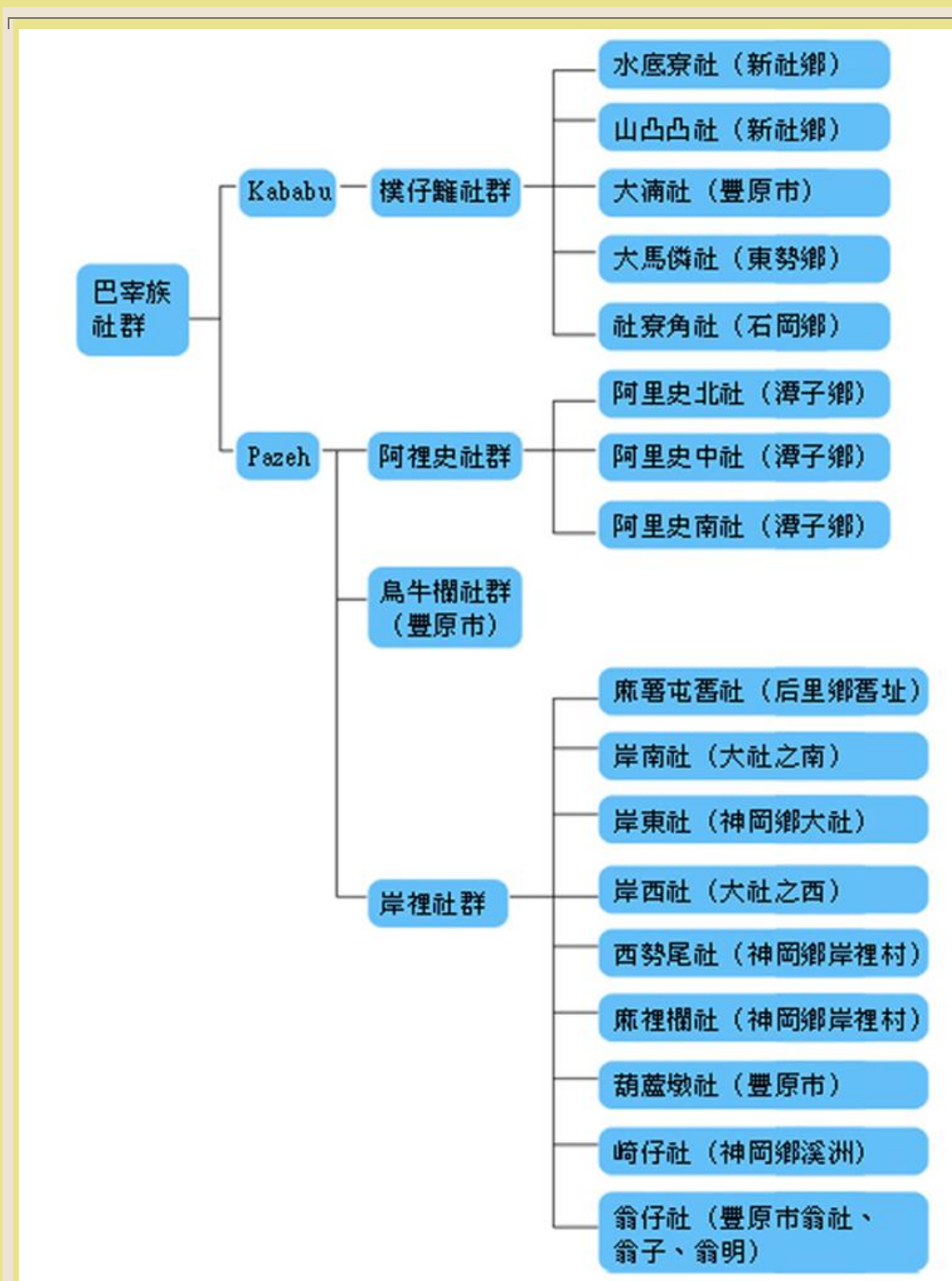


岸裡大社圖（圖片來源：國立臺灣博物館）

認識岸裡大社

根據潘稀祺的調查研究一岸裡社為巴宰族之一社群，屬南島語系，不知何時飄洋渡海抵達臺灣，定居於大甲北岸，即現今后里舊社村（麻薯舊社），直至清康熙年間，因考量墾土及統治權等，才大舉移居今大社村。

所謂岸裡社意指曾在岸裡山前活動的巴宰族。清代以來，由於移居大社村的巴宰人屢建軍功、聲譽遠播，所擁有的政治、經濟力量均超越巴宰各社群，因其盟主的政治地位及位於大甲溪南岸的地理位置，原為巴宰族語舊稱的「岸裡」，被漢人音譯並附會為「位於大甲溪南」，或「北眺恰如在大甲溪南岸」的說法；「岸裡社」亦因此成為巴宰族的總稱。



岸裡大社群分佈圖（圖片來源：國立臺灣博物館）

岸裡社群在哪裡？

由《臺灣中部地區平埔族群文物資料館社會文化資源調查報告書》的研究指出—以臺灣南島族群的傳統社會組織而言，「大社」為一個部落的單位，此名詞最早出現於乾隆五十五年（1790 年）的古文書中，故可將岸裡大社視為岸

裡九社的分佈範圍。岸裡九社指麻薯（屯）舊社、翁仔社、葫蘆墩社、岸東社、岸西社、岸南社、麻裡蘭社、崎仔社及西勢尾社等。但隨著歷史發展，社名與社數略有出入。九社之外，行政上岸裡大社另管轄阿里史、烏牛欄、樸仔籬三大社群，其下亦各自包括數個支社。

清代中葉以前，岸裡九社大致分佈於今神岡、豐原、后里等地；阿里史社群與烏牛欄社在今潭子區；樸仔籬社群則在今豐原、東勢、神岡、新社、石岡境內。即大安、大甲溪南北均為巴宰族活動範圍。自清代中葉以後，岸裡諸社或接受漢文化洗禮，融入漢人社會；或移居今埔里、鯉魚潭各地；或部份大社村的巴宰族仍舊居處於原有位置。



岸裡城門（南門）照片（圖片來源：國立臺灣博物館）

岸裡社群的聚落

依據中研院院士洪麗完的研究發現—十七世紀以前，由於傳統生活方式使然，平埔聚落最大特點為小型非固定性集村。巴宰族卻已於十八世紀初清康熙年間，在大社聚落形成一個約 200 戶、1,000 餘人小規模而固定性的平埔集村，成為早期臺中盆地北面平原以散村為主要聚落景觀之一。然其部落佈局仍與別處平埔族聚落大同小異—以竹子或樹櫟環繞周圍作為防禦工事；竹圍外緣、南北二方尚繞以人工水圳（即貓霧揀圳，日治時期改稱葫蘆墩圳），形成雙重防禦體系。

此外，狀似橢圓形的大社聚落亦設有東西南北四城門。由於北面地勢高，且為原始楓樹林分佈區域，加上林外為楓林溝圍繞，溪水湍急險隘，形成天然防禦工事，無需再設城防，故只設三座城門。其中南門（位於今豐社路 86 號右側豐社路上）為大社聚落庄門，主要通往神岡，城門牆厚，牆高如二層樓房用以守更，樓上題有「南薰獻瑞」四字。東西二門則為社民對外交通主要出口，東門（今文惠幼稚園前豐社路上）通往今豐原區，門樓題有「東山拱衛」四字；西門（今豐社路 76 巷 44 號）附近為潘敦仔居宅所在，往溪州及種田必經之地，門上題「長庚西耀」等字。東西南三門均於中部大地震後拆除。由大社城樓之厚實城牆與門上題字，均足以反映岸裡大社經濟財力雄厚，且受漢文化的影響。



岸裡社潘家葫蘆墩街（今豐原）錦祥號衣鋪印板（圖片來源：國立臺灣博物館）

岸裡大社的日常生活

洪麗完根據古籍的研究顯示－巴宰族傳統以游耕狩獵、採集為主要生活方式；前者為男性的集體活動，而採集野果、野菜則多由頭戴斗笠、手挽竹簍的女性負責為之。惟採集野生蔬果及飼養群狗以輔助打獵的習慣，二次大戰前便已逐漸消失。除米食外，野獸及魚類均是社民的重要食物，烹煮方式多以柴火烘烤為主，通常先將未拔毛之野獸予以烘烤，再使用刀刃取其內臟，與鄰人共享後，剩餘之物則餵食養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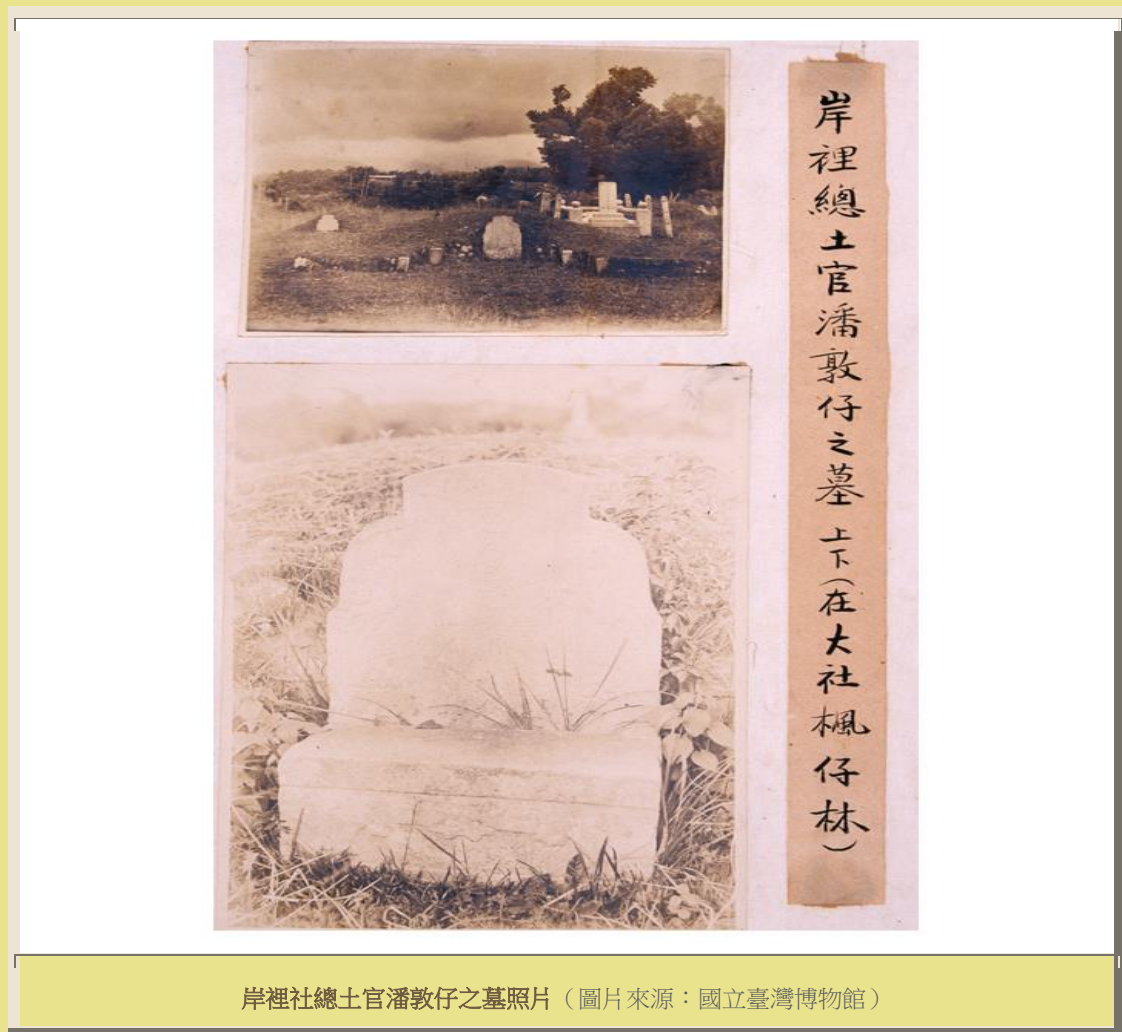
十七世紀以降，土官潘家因軍功受封賜土，擁有大甲溪以南廣闊土地，十八世紀與漢人大量接觸後（尤受漢人通事張達京影響為深），開啟了土地經營理念，割地換水以後的租佃行為便成經濟基礎所在。此外，潘家亦從事商業貿易，曾於葫蘆墩開設緞店，以「錦祥」為其商標字號；也曾設立「成記」當店，從事典當與米糧買賣。

岸裡社人的衣著



圓領無袖開襟貫頭短衣（圖片來源：國立臺灣博物館）

根據洪麗完整理文獻記載，平埔族群衣著各有不同裝飾，唯一的相同點在於衣物長度僅達肚臍之處。十八世紀以來，受漢文化影響極深之岸裡大社，社民衣著亦類同於漢人。日治時期所見社人婦女衣飾為衣裙和褲子的漢裝，均繡以花紋，惟婦女均未綁腳，是否表示巴宰族女性為家庭事務主力，或受客家文化的影響（女性為勞力來源之一，綁腳有礙工作便利）則不得而知。



岸裡社人的生命禮俗

根據洪麗完及林修澈等多位學者的研究均論及一岸裡社人賦有音樂素養，經常聚集成群唱歌作樂。若逢特別的節慶，其盛況更是空前，尤以每年祭祖曲調「挨央」（Ayian）最具代表，至今移居埔里的巴宰族仍以古調新詞的方式流傳下來。

清代接受漢文化以來，社人也接受漢人的民間信仰，除岸興宮土地祠供奉福德正神外，社人以祭拜媽祖為盛事，今社口村萬興宮，即為土官潘敦仔次子潘士興由大陸接回神像，與漢人通事張達京合建而成。自清同治十年（1871 年）基督信仰傳入後，基督耶穌便取代了民間信仰，成為大社社民的精神信仰中心。

依據巴宰族傳統習俗，逝者似為蹲姿土葬，即於人將死時，以繩綑綁四肢（呈蹲姿），再裹以鹿皮放入坑中。一般平埔族死者並無墓碑，僅以一石刻畫簡單符號作為信號，社人則學習漢人埋葬方式，以潘敦仔為例，除以「潁陽堂」為堂號刻於墓碑外，也有陪葬物。直至社人信仰基督教以後，葬禮形式亦隨之轉變，且以十字架為墓碑。



誰是牛罵頭人

▣ 王嵩山等

2000 《臺灣中部地區平埔族群文物資料館社會文化資源調查報告書》。

▣ 洪麗完

2002 《台灣中部平埔族群古文書研究與導讀：道卡斯族崩山八社與拍瀑拉族四社》。

▣ 洪麗完

2002 《台灣中部平埔族群古文書研究與導讀：道卡斯族崩山八社與拍瀑拉族四社》。

史前鰲峰山的歲月流轉

▣ 呂理政

1997 《遠古台灣的故事：認識臺灣的史前文化》。臺北：南天。

▣ 何傳坤

1996 《台灣史前文化三論》。臺北：稻鄉。

▣ 何傳坤等

2005 《小來的故鄉—台中市惠來遺址》。

▣ 郁永河

1983 《臺灣省裨海紀遊》。臺北：成文。

▣ 黃增泉、臧振華

1976 〈台灣之古生態研究（六）——台灣中部十八張，大邱園，牛罵頭，草鞋墩等史前遺址的孢粉分析〉。台大考古人類學刊 39/40：91-115。

▣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2003 牛罵頭遺址文化園區自然生態調查研究計畫期末報告。

網頁資料〈展示〉古早臺中人的故事Ⅱ> 傾聽！史前陶器提供的訊息〉，

http://www.nmns.edu.tw/nmns/04exhibit/97/97-4-ancient_taichung/crockery-message/
(2008/10/27)

▣ 劉克竑

1997 《臺灣史前人：圖繪台灣史前生活》。

▣ 劉益昌

1999 《存在的未知：臺中地區考古遺址與史前文化》。

2005 《牛罵頭遺址文化園區—歷史與人文導覽手冊》。

逐鹿清水的拍瀑拉族

▣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平埔文化資訊網」 <http://www.ianthro.tw/p/14>

▣ 中村孝志著，許賢瑤譯

1993 〈荷蘭統治下位於臺中西部的 Quatang 村落〉。《臺灣風物》，43（4）：
203-238。

▣ 王嵩山等

2000 《臺灣中部地區平埔族群文物資料館社會文化資源調查報告書》。

▣ 王穎、詹世琛

1999 《臺灣梅花鹿》。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

▣ 洪麗完

1997 《臺灣中部平埔族—沙轆社與岸裡大社之研究》。臺北市：稻鄉。

▣ 翁佳音

1992 〈被遺忘的臺灣原住民史—Quata（大肚番王）初考〉。《臺灣風物》，42（4）：145-188。

▣ 潘英

2001 《臺灣平埔族史》。臺北市：南天。

牛罵頭人到哪兒去了

▣ 王嵩山等

2000 《臺灣中部地區平埔族群文物資料館社會文化資源調查報告書》。

▣ 林修澈

2007 《巴宰族民族誌調查》，臺北：原民會。

▣ 洪麗完

1997 《臺灣中部平埔族：沙轆社與岸裡大社之研究》，臺北：稻香。

▣ 潘稀祺

1996 《潘睦派下潘氏族譜》，臺中：潘啟南派下家族。
